

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

——以《新文學史料》創刊號為例*

吳 艷

[提 要] 《新文學史料》是“新時期”第一份以刊登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它承載著歷史轉軌之際“現代文學”如何重建自身的重要使命。對創刊號進行耐心、細致的梳理,有助於重新勾勒和描摹“現代文學”在“新時期”初的圖景,同時勘探作為文學期刊的《新文學史料》如何在“新時期”參與和重構文學秩序,它又承擔了何種功能。換言之,《新文學史料》創刊號敘述了什么,以及它是怎樣進行敘述的。

[關鍵詞] 《新文學史料》 創刊號 現代文學 形象 新時期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51 - 14

1978 年 12 月,《新文學史料》(以下簡稱《史料》)創刊號正式出版。作為新時期第一份專門刊登以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它承載著歷史轉軌之際“現代文學”如何重建自身的重要使命。這一使命在進入“新時期”之後,意味著如何重新對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以及它們的性質、價值等做出新的判斷,這關係到新的文學規範的生成,也關係到新時期的“現代文學”選擇何種知識、思想資源的問題。同時,這一刊物本身的特性(以史料為主)也意味著刊物試圖以大量“史料的真實”來修復和補充此前 28 年建構的文學秩序中缺漏和不足的部分,以契合“撥亂反正”時代思潮,並開拓尚在形成期的“新時期”文學走向,因而具有特殊的觀察、分析和研究價值。從創刊號的生產過程來看,《史料》創刊號從 1978 年 3 月開始籌備,直到該年 12 月問世。在這期間,“新時期”文壇和新的文藝界秩序正處於重建和重組的過程中,一切都在將定未定之際。《史料》創刊號本身的編纂過程以及最後呈現的 51 篇文章^①攜帶了風雲激蕩之際的諸多歷史信息,是我們從起源處管窺“新時期”如何重構“現代文學”的有力抓手,也是我們觀察“撥亂反正”時代思潮如何由一個國家層面倡導的意識形態話語逐步在文學界具體落實、轉化的窗口。相當程度上,《史料》創刊號選擇怎樣的“現代文學”,就意味著“新時期”將以何種方式展開。

* 本文係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文學史料》與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研究”(項目號:2023H007)的階段性成果。

需要說明的是，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並非一次性形成，毋寧說，它是與同樣在“過程中”的“新時期”一樣，隨著歷史語境的不斷改變和自身需要，逐步發展、變化以至成型的。換言之，並沒有一個本質的、一成不變的“現代文學”，誰來選擇，選擇哪一部分，並將之進行轉化和重新激活，決定了“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而要完成這一步，既有賴編者的編輯實踐，同時，也需要《史料》最初的“作者群”積極參與。本文以《史料》創刊號作為研究對象，意在通過對創刊號耐心、細致的梳理，重新勾勒和描摹“現代文學”在“新時期”初的圖景，同時勘探作為文学期刊的《史料》如何在“新時期”參與和重構文學秩序，它又承擔了何種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史料》創刊號敘述了什麼，以及它是怎樣進行敘述的。

一、主從有序：五四新文學和左聯/左翼文學

在創刊號的“致讀者”中，《史料》編輯組詳細敘述了刊物創辦的編纂方針，核心宗旨是將五四新文學作為重建現代文學的重要起點。其背後是對《新民主主義論》以不斷進步論界定文學等級秩序的超越。^②當然，僅僅止步於強調層面顯然不夠，還需要在具體的編纂實踐和作品呈現中進一步落實。

出於對文革的厭倦，在《史料》創辦前後，“回到五四”的思潮正在眾多知識分子和作家群體中間暗流湧動：早在1977年11月25日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上，李春光就強調我們要編寫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史、文學藝術史以促進當下和未來的發展。^③此外，歷史學家黎澍在《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發表《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該文在系統梳理了“評法批儒”背後的潛在問題之後，認為儘管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們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取得了勝利，但由於我們還沒來得及徹底改變國家落後的面貌。代表剝削階級的腐朽勢力就會依然有藏身之處，因此會出現類似“四人幫”的嚴重復辟倒退現象。^④在將“四人幫”的出現界定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一定程度上為五四啟蒙話語在知識界的回歸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譬如沈從文就在多次與家人、友人的通信中反復強調封建意識的濃厚正是引發文革悲劇以及轉軌艱難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時代思潮和歷史氛圍影響下，“回到五四”成為文藝界一眾人士的心之所向。《史料》的創辦處於這一時代語境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在其創刊號中留下痕跡。

1951年9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該書最早將“魯郭茅巴老曹”樹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中心作家。此後，直到1979年唐弢、嚴家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關於這一經典序列的辛苦布局才逐漸被落實，並在日後的學科建設中凝結為“共識知識”。^⑤《史料》的創辦恰逢歷史語境轉軌之際，是否依然沿用這一文學史序列就變成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

從創刊號的最終呈現來看，顯然《史料》並非完全遵循這一序列。以我們熟悉的“魯郭茅巴老曹”為例，創刊號共提到了4位，分別是魯迅（“回憶錄”3篇，“魯迅研究”2篇）、茅盾（“回憶錄”1篇）、巴金（“訪問記”1篇）^⑥、老舍（“回憶錄”1篇，“懷念老舍”3篇）。此外，同時提到的五四新文學作家還有朱自清（“回憶錄”1篇）、王以仁（“回憶錄”1篇）、聞一多（“傳記”1篇）、郁達夫（“作家資料”4篇）、阿英（“日記”1篇）。從篇幅來說，魯迅佔29頁，茅盾佔12頁，巴金佔1頁半，老舍佔28頁，朱自清佔7頁，王以仁佔5頁半，郁達夫佔20頁，聞一多佔43頁，阿英佔11頁。涉及到七位新文學作家的部分佔總頁數的58.5%，達到創刊號一半以上的篇幅。從這一角度來說，編者確實踐行了其“致讀者”中的編輯方針，“這個叢刊以發表五四以來我國作家的回憶錄、傳記為主”。^⑦此後，以五四新文學作家為主的傳記、日記、書信、回憶錄等一直是《史料》的關注焦點。僅在內部

發行的另外三輯中，就刊登了郭沫若、許傑、馮雪峰、蕭軍、蔡元培、沈尹默、劉半農、鄭振鐸、張申府、夏衍、黃秋耘、蹇先艾、卞之琳等多位作家的作品。

讓我們再來仔細辨析《史料》主打的“回憶錄”專欄中關於五四新文學作家都講述了什麼，以及他們是如何講述的。其中，茅盾的回憶錄從他進入商務印書館寫起，^⑧因其中含納了諸多歷史信息，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茅盾選擇將進入商務印書館作為回憶的起點，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看，這一節點意味著他開始步入“社會”，也是他對自身生命歷程總結的開始。^⑨老舍的《八方風雨》^⑩是他抗戰八年的生活紀實，並且詳細講述了創辦《抗戰文藝》的艱辛歷程。從中可見動蕩年代知識分子的執守和愛國情懷。^⑪馮乃超、欽文、趙景深的三篇文章都是對魯迅的回憶，卻各有不同。馮乃超作為後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因曾在1928年參與了創造社跟魯迅的論戰，其回憶錄的側重點致力於澄清魯迅、郁達夫與創造社的關係，以及自我澄清，順帶為成仿吾平反，其背後的核心訴求是藉由正在興起的“撥亂反正”思潮以歷史參與者的身份“還歷史本來面目”。^⑫

1950~1970年代，文藝界在對魯迅經典化的過程中逐漸抽空了魯迅本身的複雜性，而使他成為某種空洞、抽象的符號化象徵。欽文的《磚塔胡同》回憶了魯迅1923年8月2日從八道灣搬到磚塔胡同後，兩人相處、交流的點點滴滴以及魯迅對他的幫助。以溫情的敘述、詳盡的歷史細節復原了更加具體、真實而又有情的魯迅。趙景深《魯迅給我的指導、教育和支持》一文詳述魯迅指導他研究民間故事、指出他翻譯的問題，以及逝世兩年前對他的幫助，並將之關聯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之中。三篇文章既對魯迅示以敬意。同時又都在不同程度召喚和呼喚更為立體、多元的魯迅形象，為新時期“魯迅形象”的重構奠定了相關史料基礎。^⑬此外，“魯迅研究”專欄刊有錫金《魯迅為什麼不去日本療養》和胡希明《柳亞子與魯迅》兩篇文章。前者回答問題，後者開辟了“魯迅與某某”的系列文章。錫金文的發表當是得益於樓適夷的引薦。^⑭

1978年是朱自清誕辰八十周年，同時又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緬懷紀念成為題中之義。陳竹隱作為朱自清的第二任夫人，深情回憶了朱自清的生命歷程：從“在歧路中彷徨”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到“他的感情已經進一步和人民聯繫在一起了”、“文學必須站在現代的立場，而現代的立場也就是人民的立場”。^⑮她以“史料的真實”（大量具體生動的細節和飽含深情的筆觸）建構了朱自清的思想轉變歷程。該文很大程度上是對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關於朱自清評價的情感轉譯，並且通過親歷者和見證者的身份強化了這一“歷史—觀念”邏輯鏈條。此外，陳竹隱回憶朱自清的紀念文章還開了《史料》上發表作家家屬文章的先河，之後以“搶救史料”為出發點的作家家屬的文章還將大量發表，作家家屬也通過其“再講述”參與了“撥亂反正”時代思潮以及對於現代文學作家形象的重構過程。

吳祖光《話說〈沁園春·雪〉》一文詳述了他在1945年11月14日重慶《新民晚報》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譚”上發表《毛詞·沁園春》的詳細經過。從文章本身來看，它感佩於偉大領袖的詩情萬丈，客觀上喚起了當時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正面回憶。《史料》的創辦本身就來自於中央的指示，此前此後，歌頌老一輩革命家也是這一時期的一項宣傳任務。^⑯吳祖光此時大力歌頌《沁園春·雪》，一定程度上也為刊物增加了一層保護色。趙家璧《編輯憶舊》^⑰一文回顧了續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期（北伐到抗戰）和第三期（抗戰八年）、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的規劃始末。作為將五四新文學經典化的重要推手，其舊文重發更具象徵意味。^⑱楊沫的《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以自己的個人經歷敘寫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的思想歷程。是在歷史轉軌的“新時期”重新對既往選擇革命道路的肯認，具有鮮明的示範效應。楊沫也是“新時期”初較早恢復創作發表權利的作家之一。許傑《憶王以仁》追

憶了青年時好友王以仁的生命歷程和文學創作成就，認為其自殺是“物質決定精神，客觀環境和時代思潮，決定青年作家的精神世界”這一歷史趨勢的必然結果，瀰漫在文章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滄桑感和強自勉勵的惘然。此外，“日記”欄刊有阿英《第一次文代會日記》，是阿英遺稿。阿英於1977年6月17日因病逝世，此後即有文藝界人士的紀念文章面世，^⑩該文係其家屬發現後送到《史料》編輯組，紀念緬懷也屬理所當然。

從以上分析梳理可以看出，“回憶錄”專欄的五四文學老作家都首先把目光聚集到五四時期甚至更早，他們試圖通過對於那一時期相關人事、個人經歷的再回顧，重新喚起更多人對於五四的懷念和肯認。從“回憶錄”專欄的作者構成來看，其中，魯迅、茅盾、朱自清、阿英都曾參與了《新文學大系》（第一期）的編纂工作，趙家璧則是有力的推動者。許傑回顧了作為同時代人的王以仁，展示了另一種“五四文學青年”的形象。楊沫則是五四一代作家的學生輩，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接續”。而從“回憶錄”本身的編纂來看，“魯郭茅巴老曹”顯然並未成為《史料》創刊號的標尺。即使對於五四新文學作家的選取，也曾參與《新文學大系》編纂的蔡元培、胡適、鄭伯奇、周作人此時就未能列入其中，這與彼時官方對他們的認定尚未緩和密切相關。

除了聚焦於五四新文學，對於左聯/左翼文學的關注也是創刊號的重要著力點之一。“訪問記”一欄刊發了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對於巴金、任白戈、艾蕪、鄭育之、段可情五位同志的談話記錄，幾乎都涉及對於1930年代左聯前後相關問題的追憶。其中，巴金追憶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任白戈講述了1933年加入左聯後又前往日本左聯支部的過程。艾蕪除講述自己參加左聯的經歷之外，還特別提到了“兩個口號”論爭問題，立場、態度均鮮明可見，直言“胡風在兩個口號論爭中挑撥離間，起了很壞的作用”。鄭育之作為周文夫人，回顧了周文和三十年代左聯活動的一些情況，並涉及對胡風、馮雪峰等人的看法。段可情則簡要提及了1926年回國後參加創造社的相關情況。此外，“中國戲劇運動”專欄發表了趙銘彝的《左翼戲劇家聯盟是怎樣組成的》，該文梳理了大革命前後我國戲劇運動概況、以上海為中心的戲劇活動、上海戲劇界的大聯合以及火紅的1930年（該年左翼劇團聯盟成立），建立了一條中國戲劇運動發展的線索和脈絡。

為顯示視野開闊，《史料》創刊號還將目光投向了國外。創刊號辟有“關於《活的中國》”專欄，詳細介紹了《活的中國》的編者序言、目次、附錄，以及蕭乾和楊剛的兩篇評論。《活的中國》^⑪是埃德加·斯諾和他當時的妻子海倫·福斯特編譯的一本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斯諾編譯這本小說集的原因是“急於想了解‘現代中國創作界是在怎樣活動著’，並讓西方讀者也了解他們的情況”。^⑫蕭乾在他的評論中將《活的中國》視為《西行漫記》的前奏，並且強調魯迅的重要影響，^⑬由此建立了一條從魯迅到《活的中國》、《西行漫記》的因果邏輯鏈條，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活的中國》所描述的“現代文學”形象建構合法性和重要性。

而《活的中國》能夠在《史料》創刊號上發表，一方面與斯諾的特殊身份有關。斯諾作為國際友人，因《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聞名於世，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又多次前往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有密切溝通與交流。他毋庸置疑可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⑭另一方面，蕭乾作為《史料》的顧問，在三十年代與斯諾有過密切交往，直接參與這本書的翻譯工作，由他引入斯諾，合情合理且順理成章。

從《活的中國》目錄看，顯然斯諾的視角又略有差異。《活的中國》分為“魯迅的小說”和“其他中國作家的的小說”。斯諾選擇將魯迅單列出來，是因為“魯迅那胸襟寬廣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滿腔熱情以及對周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對於其他作家的選取，以後置視

角看,左翼作家和自由主義文人都有所涉及。顯示了包容開闊的姿態。附錄的兩篇文章其一梳理了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的線索,其二則提供了相應的參考書目,打開了現代文學更為豐富、多元的面向。《史料》創刊號選擇重新發表《活的中國》,很大程度上也在衝擊五十至七十年代形成的文學史敘述。

由上觀之,無論是從篇幅設置,還是編纂對象來看,《史料》創刊號對於五四新文學和左聯/左翼文學的呈現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主從有序”而又錯落有致的分布格局:以五四新文學為主體,致力於重新發揚五四新文學的價值,以構建“新時期”的文學場域,同時又適當為左聯/左翼文學留出空間。而這一編纂序列的布局顯然為五四新文學在“新時期”重新復活奠定了史料和知識、思想基礎。

二、“死魂靈”背後的歷史情感與觀念機制

除了有選擇地重新激活五四新文學的相關史料以重構“新時期”的知識、思想、話語資源,建構文壇新秩序和新的文學史序列外,《史料》還需回應歷史轉軌之際的特殊時代課題。從大的範圍看,1970年代末的中國社會要完成歷史轉軌,仍需花大力氣來處理和解決幾十年來積累下的歷史遺留問題。於知識界而言,則包括文革中冤假錯案的平反、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害者的平反問題等。隨著撥亂反正政策的逐步落實,“各地舉行的追悼會無法計數,一個時期人們幾乎每天都聽到哀樂低回,領導人的許多時間消磨在八寶山靈堂”。^③《史料》顧問樓適夷也在1978年6月13日給黃源的信中寫道,“對外活動不多,倒是常常跑八寶山”。^④一個殘忍的事實是,如同“死亡”孕育著“新生”一樣,“新時期”的到來同樣意味著一代人的生命已經/即將走向終點。這其中,有生命本身的更替,更多的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難者被平反,並舉辦追悼會。就此而言,知識分子群體確實付出了異常慘痛的代價。

為了緬懷逝去的文藝界人士,^⑤《史料》創刊號特意辟有“悼念”專欄,^⑥並將這一傳統延續至今。除了“悼念”專欄之外,從篇幅來說,《史料》創刊號鄭重緬懷的“死魂靈”有三位,他們按照出場順序依次是聞一多、老舍和郁達夫。分別在“傳記”專欄(王康《聞一多傳(一)》)、“懷念老舍”專欄,^⑦以及“作家資料”專欄。這一看似偶然的選擇,實則內蘊著歷史轉軌之際特殊的歷史情感和觀念機制。

1946年7月15日,曾以詩歌創作參加五四文學革命,後赴美留學,輾轉北京、武漢,步行前往昆明並在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的詩人、學者、民主戰士聞一多,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針對這一事件,延安《解放日報》直接指斥國民黨為“殺人犯政府”。而《中央日報》則極力轉移視線。聞一多之死激起了當時文藝界多位人士的悲憤。此後,對他的紀念一直綿延不絕。王康作為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兩人又有叔侄關係,成為《聞一多傳》的不二人選。早在1947年清明節前夕,王康就寫成《聞一多的道路》。1958年,為紀念聞一多殉難十二周年,王康出版《聞一多》(署名史靖),1962年,王康又寫成《聞一多傳》初稿。^⑧“新時期”到來,王康積極修訂書稿,並諮詢文藝界相關人士意見。其長期對聞一多傳記的深耕,為《聞一多傳》最終能在《史料》創刊號上發表奠定了相應基礎。

此外,還應注意到《聞一多傳》的周邊。據張光年日記,1978年4月24日,他“晚訪周揚,交出校改發言稿。為《聞一多全集》事徵求意見,歸來就此事與文井商談”。25日,“嚴文井來談有關重版聞一多著作問題”。6月20日,“翻閱王康贈閱的《聞一多傳》幾個章節,考慮電影劇本的修改意

見。王為一來電話約談，定明天上午約他們來談，打電話邀王康同志明天上午也來參加”。6月21日，“上午王為一、趙丹、黃宗英、珠江電影廠兩位同志應邀來談。聽王為一介紹情況後，我就影片用真名假名問題，聞一多的思想發展、時代背景、共產黨員形象等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24日，“上午到出版局參加由陳翰伯召開的討論聞一多全集問題的小會，初步商定了第一、二步計劃”。7月29日，“上午聞立鶴、立雕來訪，同他們談了有關電影劇本（《拍案頌》）、聞一多文集問題，並回憶昆明舊事”。^③

可見，圍繞在王康《聞一多傳》周邊的是聞一多全集的出版、電影《拍案頌》的拍攝等相關事宜。在歷史轉軌之際，聞一多因著此前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直接、正面的肯定而成為重點宣傳、出版對象。也因此，《聞一多傳》篇首所附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語錄^④並非點綴，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毛、周二人的雙重肯定恰好構成《聞一多傳》的文眼和內在規定性，也成為《聞一多傳》意識形態的表徵。王康最終在《史料》創刊號上呈現的《聞一多傳》攜帶著歷史轉軌之際的特定痕跡，多處將聞一多與周恩來等領導關聯起來，本文將之稱為“紅色筆法”。^⑤

相較於聞一多犧牲的悲壯、慘烈。老舍之死無疑是文革中知識分子受難的一個重要象徵。文革結束後，為老舍冤案問題，胡絮青曾多次向有關領導寫信，希望早日作出結論。^⑥1977年8月13日，鄧小平就老舍夫人胡絮青請求盡快給老舍作結論一事，作出批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⑦鄧小平作為政治權威，其對於老舍作出結論的批示仍需落實到文學/學術層面，並被轉化成重新經典化的文學史話語，才有可能真正完成這一工作。需要補充的是，對於老舍的評價問題不只關涉到中國文藝界，還涉及國外對於中國的認識。1977年10月12日，沙汀走訪冰心，冰心就談到“蘇聯有的報刊在老舍問題上大作文章的險惡用心”。^⑧也就是說，國際輿論也會影響“新時期”撥亂反正工作的展開方式、路徑和力度。

在鄧小平下達批示後，1977年《人民文學》、《北京文藝》和《上海文學》相繼發表了老舍遺作。^⑨1978年2月18日，張光年在日記中寫道：“趙樹理的女兒廣建來，訴說趙樹理（冤案）問題。胡絮青及女婿來談老舍（冤案問題）。 ”^⑩彼時，胡絮青為老舍冤案問題曾多次走訪文藝界相關人士。“文革”結束，“日常”歸來，文人間的走動也成為世態人情中的常態。4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絮青《〈老舍劇作選〉再版後記》，文章強調“他的一些劇本的確是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遵照敬愛的周總理的點題而創作的”。^⑪5月12日，樓適夷在給黃源的信中提到：“與老舍夫人談老舍，相對愴然。最近擬舉行追悼會，遺體火化，連骨灰也不許領，現在骨灰箱裡，只放一副眼鏡、一支筆。他的遺物、遺稿，也都散失掉了，收回寥寥。現在他女兒正在設法收集，出版社決定派人去幫助整理資料，寫回憶，制年表等。”^⑫6月3日，北京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老舍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3日上午，正逢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百餘名代表下午都去八寶山參加了這一儀式。6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文章借悼詞為老舍定論：“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敬愛的周總理，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⑬至此，老舍的冤案問題徹底解決。此後，老舍夫人分批次答謝文藝界眾人。據艾蕪1978年6月6日日記，“晚上老舍夫人胡絮青及其子女，請我和巴金、歐陽山、于黑丁、駱文、陳登科、陳殘雲等人吃晚飯”。^⑭張光年1978年6月11日日記：“下午6時偕羅蓀、白塵一起去八面槽首都飯店應老舍夫人胡絮青邀吃晚飯，默涵、馮牧、賀敬之、謝冰心、曹禺、沙汀、嚴文井也應邀去了。”^⑮

在這一系列重新為老舍平反和恢復名譽的舉措下，《史料》創刊號刊發老舍文章並辟有“懷念

老舍”專欄就顯得水到渠成且順理成章了。同時,在選取老舍《八方風雨》一文時,饒有意味地配了一張老舍與偉大領袖合影的插圖,這其中的和解意味不言而喻。在“懷念老舍”專欄中,樓適夷《憶老舍》一文寫於1978年7月15日,係參加老舍追悼會後的感受。錫金回顧了抗戰文協時期的老舍,一如其文章題目:嚴肅、勤懇、誠篤。李長之和高君箴更大程度上表達著他們作為歷史幸存者的哀思。舒濟是老舍長女,其回憶老舍文對於老舍形象的建構參與到“撥亂反正”的時代大潮中,文中多處表述契合著當時的具體情勢。⁴³此外,其他刊物也紛紛發文對老舍表達懷念之情。⁴⁴

聞一多是1940年代民主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典型,老舍則在新中國成立後就享有“人民藝術家”的美譽,並且在建國後寫有大量歌頌新中國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從政治立場,還是文學創作,他們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正面性。而郁達夫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就在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的前一年(1945年),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死於日寇之手。郁達夫之死曾經長期是學界研究的一個關注點。胡愈之早在1946年9月9日就寫有《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對郁達夫南洋時期的具體形狀進行了細致回顧,並且強調:“對於象達夫這樣一個複雜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作一個正確的評價,應當是未來中國文學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⁴⁵然而,胡愈之所期待的給郁達夫“一個正確的評價”的研究局面遲遲沒有出現。長期以來,郁達夫留給很多讀者的印象都是“頹廢詩人”,解放後其作品出版很少,相關研究也很匱乏。但同時,郁達夫之死作為一個悲劇性事件很大程度也加劇了歷盡滄桑的文藝界多位人士的肯認。《史料》創刊號重新對胡愈之文進行刊載,其用意之一也是重新喚起文藝界人士對於郁達夫的重視。⁴⁶

此外,在圍繞郁達夫的“作家資料”專欄中還刊有馮雪峰遺稿《郁達夫生平事略》、馮雪峰編的《郁達夫著作編目》以及郁達夫的《離亂雜詩》詩作遺稿。馮雪峰1976年1月31日逝世時,因“文革”尚未結束,無論是追悼會還是歷史評價問題都沒有結論,《史料》刊發其遺稿同樣是一種對馮雪峰的緬懷紀念。而郁達夫遺作能夠發表則得益於黃源的引薦,《史料》編輯組成員黃沫於1978年5月下旬南下組稿,黃源在1978年6月18日給樓適夷的信中寫道:“昨天我去‘新新’找了黃沫二同志,介紹他們去富陽找,郁達夫有一部四五首舊詩的詩稿。”⁴⁷由郁達夫遺作的發表看,《史料》編輯組確實在“搶救史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如眾所知,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一直被裹挾在政治化的浪潮中,20世紀知識分子和革命之間的關係也從來都是文學史、思想史上長期關注的重要課題。“革命的那種暴風驟雨式的行動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愛情、友情和命運感,使人捲入一種改變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直接感受,這對於任何一個尚未腐敗的心靈都是巨大的誘惑。”⁴⁸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聞一多、郁達夫、老舍三位作家都不同程度參與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浪潮。聞一多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郁達夫死於日軍之手,老舍則因在“文革”中不堪凌辱選擇自殺。對於革命的高度介入使得他們三人之死早已超出簡單的個人生老病死的範圍,而成為大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的死亡關聯到“犧牲”,關聯到“歷史的代價”,而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的“肉身獻祭”更是加劇了這其中的悲劇色彩和複雜意味。

當我們從歷史中人的身心感受來觀照歷史中人的心理機制、情感牽動、行動邏輯,對樓適夷的“愴然”,老作家們的重逢、悲慨當能有一份更深的體察和理解。也就是說,當歷史來到“新時期”,幸存者們需要以儀式化的情感傾吐傷痕、寄托哀思,以慰藉在“不斷革命”中犧牲的“死魂靈”們,這是屬於新時期歷史轉軌之際特有的觀念機制和情感內涵。《史料》編者選取這三位“死魂靈”看似是偶然的巧合,背後卻有著近乎無意識的情感結構和觀念機制:一方面與他們本身的特殊性有關

(這三人的文學創作、思想觀念在歷史轉軌之際能夠獲取更大範圍群體的肯認)。另一方面,基於此前歷史中知識分子受難的屈辱歷史,這三位的“死魂靈”以及圍繞著“死魂靈”所產生的種種歷史細節將 20 世紀知識分子命運這一宏大而沉重的課題推至我們眼前。除了情感層面的共鳴、共感外,其背後的核心觀念機制是為知識分子平反,通過“還歷史本來面目”讓這一群體重返歷史舞台。而調動的方式就是通過大量“史料的真實”與此前的宏大話語敘述構成對峙、辯駁,由此,讓劫後幸存的知識分子群體在與過往和解的同時,能明確自身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進而重塑“新時期文學”的新秩序和新規範。

三、書訊,質疑,內部發行與話語空間的開拓

如果說《史料》對於“死魂靈”的儀式化紀念是為了回應歷史遺留問題,讓此前飽受滄桑和屈辱的知識分子重返“新時期”的舞台,關聯到“撥亂反正”思潮中的“平反”這一核心命題。那麼,“新時期”的“現代文學”究竟如何生成,則與這一時期叢書的出版、讀者的評論、出版發行的範圍等因素密不可分。本節將圍繞這三點進一步細描“現代文學”在《史料》創刊號的具體生成樣態。

《史料》創刊號“簡訊”欄中有三則書訊,^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署名文彥的《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將於“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期間開始出版》。全文如下:

為了比較系統地整理總結“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並以事實駁斥“四人幫”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文學運動的污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組正在編選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編選“五四”到建國以前的短篇文學作品,分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獨幕劇四個部分。全書力求反映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發展過程,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反映新文學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因素,以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反映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文學統一戰線隊伍的成長發展和戰鬥業績。所選的作品,以革命的和具有進步傾向的為主,兼顧不同的流派和風格。在編選過程中,著重選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生過較大影響或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同時注意現實的需要,主要挑選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和鬥爭,迄今仍有一定思想意義或在藝術上可供借鑒的作品。

這個工作,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不少作家的熱情支持。他們或者推薦篇目,或者提供資料,推動了編選工作的順利進行。

現在,短篇小說部分已經定稿,計選作家一百九十餘人,作品二百九十餘篇(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解放以後第一次出版的),約三百一十二萬字。爭取明年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時出書,其餘各卷,正在分頭編選中,準備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兩年內陸續出版。

(著重號為引者加)

從這則簡訊內容來看,編輯出版十卷本書籍的目的,一來是為了系統整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二來也是想以紮實的選集成果來清除“四人幫”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文學運動的污蔑。這與當時國家層面提倡的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相呼應。而強調新文學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因素,以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則並未脫離當時依然具有規定性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敘述框架和歷史邏輯的影響。這一點可看做是一種策略性表達。需要注意的是,儘管這則書訊表述嚴謹、穩妥,幾無任何紕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解放以後第一次出版的”,這一原本帶有介紹性質的表述,恰恰蘊含著突破和掙脫新民主主義敘述框架的能量。原因在於,除了少量屬於軼文軼作的文章,諸多文學作品(比如自由主義作家的作品等)是因為不符合這一敘述框架才在此前

的歷史中沒有出版的可能。也就是說，雖然看起來是一則簡單的書訊，但其背後卻內蘊著歷史轉軌之際的“時與勢”以及重新打開歷史的動能。正在展開的“新時期”需要以大量實際的文學出版重構新的文學秩序，在一套叢書中，出版三分之一解放後未曾出版的，從體量來說，這本身就構成一次大的衝擊。由此可以想象的是，既往在 1950~1970 年代形成的美學原則、觀念構造、文學史敘述模式等將要因著這一批作品的第一次出版進行“歷史重評”。

除了書訊本身所昭示的更為豐富、多元的“現代文學形象”的到來之外，有效的質疑同樣是開辟話語空間的重要路徑之一。尤其是在一切都處於形塑過程中的 1978 年。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何種話語、觀念，均需在場域的博弈中通過不斷證實自身合理性與合法性獲取共識，進而成為某種群體共識，然後再傳播。《史料》創刊號通過親歷者的論述凸顯了這一點。

在“中國戲劇運動”專欄中沈蔚德寫有《回憶〈蛻變〉的首次演出——兼論關於〈蛻變〉的評價問題》，他認為：“這個劇本既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貪污腐朽的官僚統治的行政制度，又提出在抗戰中‘蛻’舊‘變’新，建立‘新形式的國家’的對光明未來的美好願望，這在當時起了鼓舞人民抗戰熱情的好影響。”^⑤沈蔚德作為戲劇《蛻變》中的一個演員（飾演丁大夫），以參與者的身份詳細敘述了《蛻變》編排、上演（中間受阻）的具體過程，以及自己在飾演丁大夫這一角色時曹禺對他的幫助。並且在第三部分中與《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國新文學史稿》中關於《蛻變》的評價進行辯駁和對峙。針對《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下卷裡“劇本中對於這個後方醫院的黑暗情況的暴露”，“沒有聯繫到國民黨反動派全部政府機構的糜爛情況”，“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偶然的個別的醜惡現象來加以處理”的論述，沈蔚德認為：“這種批評不很公平，而且忽視了文藝創作的典型化原則。文藝作品反映生活需要概括集中而加以典型化，因而可以通過個別以見一般，以部分代表全體。”並且用劇中的具體細節進行辯護。針對“劇本中所創造的作為‘新的生命’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沒有現實基礎的”的質疑，沈蔚德也以實例分析作了更為具體的還原式說明。^⑥其中涉及是否有效揭露黑暗面、對於“新的生命”的描繪和謳歌是否有現實基礎、人物形象是否真實可信等問題。沈蔚德以直接參與者的身份復原當時話劇創作的具體語境，進一步打開了討論和研究的話語空間，也意味著此前的文學史敘述隨著新時期的展開，將面臨一系列來自直接參與者們的考驗和衝擊。此後，《史料》也陸續刊發了諸如研究者、作家家屬的質疑、辯駁文章，將質疑/論爭的形式貫穿到刊物編纂實踐中，開掘出了更富歷史張力的話語空間。

如果說書訊和質疑從編者和讀者兩個維度挑戰了既定的文學史敘述規範，內蘊著新的“現代文學”形象的開啟。那麼，“內部發行”的傳播方式則更進一步保障了《史料》本身刊載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誠如李建立所說，“作為中國當代史上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播方式，‘內部發行’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扮演過多種角色。‘內部發行’的‘內部’顯然不能與表述‘人民內部矛盾’時的‘內部’等同，而是對大的受信任群體的再區分，是政治身份的配給品”。^⑦洪子誠也提到：“大致到了 1978 年和 1979 年，‘內部發行’的出版物，與‘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內部發行’性質有了不同。有部分內部發行圖書，是借‘內部’來處理一些公開發行仍有所顧忌的書刊，銷售渠道已經放寬。”^⑧《史料》顯然隸屬其中。也因此，《史料》並不容易購得。1978 年 10 月 12 日，黃源致信樓適夷：“《史料叢刊》是內部發行，我怕訂不到。請你代訂三份如何。款由兄先付一下，再還。”^⑨而事情常常是，越是內部發行，往往越容易引起讀者的好奇和閱讀興趣。換言之，這種基於群體再分配的方式，常常引起未在分配中群體冀圖介入和參與的心情並為此付諸行動。《史料》創刊號在“致讀者”中提到，它“以作家、編輯、記者、文學研究工作者、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工農兵中的文藝愛好者

(包括業餘作者)為對象”。由對於讀者群的界定可以看出,《史料》的理想讀者大多都從事文藝工作,並且具有相應的文學知識和文學素養。這樣的好處是,在具有知識積累和文學素養的讀者群中可以相對名正言順地出現有爭議和衝突的內容,上文所舉沈蔚德對於文學史家們評價的質疑即為其中一例。除了刊載有爭議的評論,發表尚未獲得正式平反的作家作品也是《史料》藉由“內部發行”的名義刊發。以聶紺弩為例,聶紺弩於1976年11月2日重返北京,但直到1979年3月10日,“在某些高層領導人的過問下,北京高院才撤銷原判,宣告無罪。4月7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正錯劃‘右派’,恢復黨籍、級別、工資、名譽,並聘為該社顧問”。⁵⁵也就是說,《史料》創刊號上發表聶紺弩悼念蕭紅舊體詩時,聶尚未平反。儘管只能在“補白”專欄中出現,但聶詩的發表本身同樣是一個極富象徵意味的徵兆:既是對動蕩年代知識分子(蕭紅)的悼念,同時,又潛含著為聶紺弩平反的意味。需要說明的是,聶紺弩悼亡詩得以發表當係牛漢的約稿,據牛漢回憶,“1976年冬天聶紺弩從山西回來,我和舒蕪第二天就去看望他”,“1977年至1978年,紺弩在西城北師大女附中附近的郵電醫院住院,我每個禮拜去看望他”。⁵⁶在這個意義上,《史料》藉由“內部發行”的形式拓寬了“現代文學”形象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除了“內部發行”本身所具備的敞開性之外,我們也要注意從“內部發行”到“公開發行”的過程。以同樣是“新時期”初內部發行的《世界文學》和《外國文藝》為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主辦的《外國文藝》(創刊於1978年7月,雙月刊),在出版12期之後,1980年第3期才改為公開發行,歷時近兩年。而1977年9月復刊的《世界文學》⁵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則因遵循了一條相對穩妥的編纂方針,在1978年10月就獲得了公開發行的資格,歷時一年。以不定期形式內部發行的《魯迅研究動態》則是在出版了60期後才得以公開發行。而《史料》在1979年第五輯之後,不到一年就從內部發行改為公開出版。這一方面得益於它是在中央指示下創辦的,具有“准官方”性質。另一方面,《史料》所刊內容本身的豐富、駁雜也降低了歷史轉軌時期意識形態層面的風險性,獲得了相應的免疫能力,從而使得它相對較快地由“內部發行”轉為“公開出版”。在樊駿的觀察視野裡,從內部發行改為公開出版同樣意味著“史料工作在觀念上和做法上的變化:從作繭自縛的神秘化走向開放,從局限於少數專業工作者的交流變為面向國內外的各界讀者”。⁵⁸

這樣,書訊通過增加出版此前喪失出版發表權利的作家作品的數量為“新時期”“現代文學”形象提供更為豐富多元的底座、基數,挑戰1950~1970年代一體化/同質化的文學創作和美學觀念;歷史參與者對既往文學史敘述對峙、辯駁,以質疑的形式力爭突破既定話語、觀念的規定性和限制,開拓更富活力和多種可能性的話語空間;而內部發行的傳播方式一定程度上也為新時期初“現代文學”形象的輪廓、形狀开辟了更為多元的話語空間。以上三個層面均在不同程度打開了“現代文學”在“新時期”的可能性,且呈現出多元、駁雜且富有活力和生機的景象。

餘 論

此處,蕩開一筆,補充葛一虹讀完創刊號後於1979年1月1日寫給《史料》編輯組的信件,原文如下:

承蒙贈《新文學史料》第一輯,匆匆捧讀一過,覺的(得)很新穎很充實,它的編印出版是極有意義的。我讀時,有許多往事不禁回憶起來,不勝感慨之。老舍先生《八方風雨》中提到1939年作家戰地訪問團,我參與其役。這在當年是件大事,從重慶出發時有十四人,而今存世的也不多了。我曾想提筆寫一短文追記其事,但一時還不暇及此。記得

1946年在鄭振鐸先生所編《文藝復興》上，我發表過一篇題作《悼念王禮錫先生——兼記作家戰地訪問團》的文章，似可供參考。不知是否值得轉載，□予翻閱（原信此處有一字難以辨識——筆者註）。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也很想寫點東西，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並澄清一些問題。現還在搜集材料，俟有所得，當再請教。感謝你們寄來這本好書，勿此不盡，祝寫作順利。

葛一虹的回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時期”初文藝界老作家們的心聲。於他們而言，《史料》的出版具備了症候性的“喚起”功能，它在召喚老作家們重新回顧往事，並對之進行歷史的清理和反思。蹇先艾就曾寫信給《史料》編輯組，“《新文學史料》第一輯有不少第一手資料，極為難得，一定爭取本月內給你們寫一兩篇五四時期的文學史料短篇”。^⑤魏猛克也對《史料》多有關注：“《新文學史料》這個內部刊物，倒有點意思。在目前，特別感到那些回憶的內容新鮮有趣。有的老人談自己，頗談出了自己的性格，越談得起勁，他自己就在紙上越加活跳起來。”^⑥從另一個層面也說明，《史料》創刊號一經出版發行，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這種“召喚”機制隨後引起了更多老作家的參與，也意味著《史料》將不斷釋放新的活力空間。

通過以上對《史料》創刊號的重新描摹和勾勒，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看似內在於刊物研究的內部事件，其實與1978年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響密切相關。由於《史料》創刊號是“新時期”第一份刊登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對於編輯組成員，還是此時因“撥亂反正”而平反的老作家們，一定程度上並無能夠清晰把握、遵循的標尺，而只能是邊辦、邊寫、邊看，“摸著石頭過河”。也因此，“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遠非後來文學史敘述的那樣清晰分明，而是呈現出更為駁雜、豐富的模糊樣態。以“搶救史料”為名，混合了五四新文學、三十年代左聯/左翼文學、斯諾眼中“活的中國”、緬懷“死魂靈”（其中又涉及作家的平反工作）、書訊、質疑等內容含量豐富又多元的“現代文學形象”在《史料》創刊號上誕生了，依附在這一“現代文學形象”上的多種意識形態話語/非意識形態話語，因著歷史當事人身份的加持，都在其中以相對妥帖、契合的方式得到安放，而其背後都指向了與“撥亂反正”思潮之間的複雜關聯。

① 其中包括“回憶錄”10篇，“訪問記”5篇，“傳記”1篇，“懷念老舍”5篇。“魯迅研究”2篇，“日記”1篇，“作家資料”4篇，“中國戲劇運動”2篇；“關於《活的中國》”4篇，“考證”1篇；“軼文軼事”6篇，“文物”1篇；“簡訊”3篇，“補白”2篇，“悼念”4篇。

② 可參見吳艷：《〈新文學史料〉與新時期文學》（長春：《文藝爭鳴》，2021年第12期）。該文第三部分分析了刊物的命名為何是《新文學史料》而非《現代文學史料》，本文現依據學界通用慣例，統一稱為“現代文學”。

③ 李春光：《斬草必須除根》，北京：《人民日報》，1977年12月7日。

④ 黎澍：《評“四人幫”的封建主義》，北京：《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

⑤ 參見程光輝：《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8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1頁。

⑥ 1978年10月前後，蕭乾致信巴金為《新文學史料》邀稿，巴金回覆“關於《家》的那本書，能複制很好，你要在《史料》中介紹，我不會不同意。至於要我寫什麼，目前恐怕寫不出。我現在寫點《創作回憶錄》，但不能給《史料》發表，因我文債很多，需要一一還清。你想寫什麼，就寫吧。能多寫，最好。不必管別人說什麼。”參見文潔若：《倆老頭兒：巴金與蕭乾》，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5年，第130頁。這封信從側面解釋了巴金為何沒有給《新文學史料》創刊號寫回憶錄。

⑦ 《致讀者》，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⑧茅盾自從1973年秋在報紙上重新亮相之後，就有老編輯向陳小曼建議動員茅盾寫回憶錄，茅盾未同意。1976年周恩來逝世，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茅盾感到世事維艱，想要留下一份歷史證詞，於1976年3月24日，採取口述錄音與文字整理同步進行的方式開始了回憶錄的寫作。參見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第274～276頁。

⑨茅盾原本“打算從中學寫起，中學那幾年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對他的一生，有很大影響；他還講到回憶錄的重點將放在三十年代……因為‘四人幫’粉碎以後，已經有了搜尋大量舊報刊的可能。他又決定從進入商務印書館寫起，因為自己就是從那裡開始新文學工作的”。參見本刊編輯組：《記茅公為本刊撰寫回憶錄的經過》，北京：《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⑩文章末尾落款“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原載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北平《新民報》。

⑪在該文末尾，老舍以一首七律古詩結束了這段八方風雨的歷程，“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願半庭花！/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矜角斜；/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發待歸鴉！”另：老舍這篇文章的發表當與樓適夷有關。此前，樓適夷在與黃源的通信中提及老舍在抗戰文協這一時期的重要性，重新發表老舍本人的文章無疑是最好的說明。

⑫該文配圖選取了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1926年的合影，意在以圖片撫平三人之間的差異。饒有意味的是，原本的四入合影，此處因文章需要，刪去了創造社成員王獨清的照片。

⑬關於“新時期魯迅形象重構”問題，可參見徐妍：《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⑭1978年5月2日樓適夷致信黃源：“錫金打算回長春，以後魯研室內訊少了。他是很想調回北京的，但難。姜椿芳向中央建議設新出版機構搞大百科全書，有可能實現。此事如成，我考慮要姜把錫金調來。他年來研究魯迅，已寫了一些論文，我正勸他陸續發表。他考證甚勤，也有見解，是一把好手。”參見

巴一熔、黃煒編：《黃源樓適夷通信集》（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頁。

⑮陳竹隱：《憶佩弦》，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⑯如1978年5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為繁榮文藝創作而奮鬥》等。

⑰該文原載1957年3月21日，5月15日《人民日報》。另：趙家璧文章重發，當係牛漢約稿，“趙家璧到出版社找我，我便請他為‘史料’寫回憶文章”。參見何啟智、李晉西編撰，牛漢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206頁。

⑱根據趙家璧的回憶，“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人寫大字報，指罵這兩篇文章是我這個‘漏網右派’當年所寫典型的‘大毒草’。現在這兩篇舊作已蒙《新文學史料》把它分兩期全部重新發表了，這對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參見趙家璧：《回憶鄭伯奇同志在‘良友’》，北京：《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5輯。由此可見，該文的重新發表也有平反意味。

⑲緬懷阿英的紀念文章有：《阿英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北京：《人民日報》，1977年6月29日；張愷帆：《緬懷阿英同志》，合肥：《安徽文藝》，1977年第10期；夏衍《憶阿英同志》，北京：《戰地》（係《人民日報》文藝部刊物）1978年第S2期等。

⑳該書在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隸屬於“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系列叢書。

㉑埃德加·斯諾：《〈活的中國〉編者序言》，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㉒“由於魯迅先生的指引，斯諾這位外國記者並未停留在‘熱消息’上。他以更多的精力傾注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探討上，通過沸騰的三十年代所產生的文藝作品，探索了中國人民的恨與愛，咒詛與憧憬。正因為他窺見了現實更為本質的方面，體會到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才於一九三六年突破黑暗的重圍，奔赴陝北革命聖地；他才象另一個美國記者——《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約翰·里德那樣，洞察到人民革命勝利是歷史的必然規律。”蕭乾：《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記〈活的中國〉》，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㉓石川禎浩在《“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一書中分析了斯諾《西行漫記》在建國後的

出版情況(參見該書第194~206頁),相較於其他國際友人,斯諾無疑有著更為突出的重要性。

②④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96~97頁。

②③④⑦⑤④巴一熔、黃煒編:《黃源樓適夷通信集》(下),第81頁;第68~69頁;第82頁;第117頁。

②⑥自1976年起,文藝界多位人士相繼過世。1976年計有:馮雪峰(1月31日,終年73歲)、孟超(5月6日,終年74歲)、馬可(7月27日,終年58歲)、郭小川(10月18日,終年57歲)、鄭律成(12月7日,終年58歲);1977年計有:黃谷柳(1月2日)、徐懋庸(2月7日,終年69歲)、阿英(6月17日,終年77歲)、何其芳(7月24日,終年65歲);1978年計有:郭沫若(6月12日,終年86歲)、柳青(6月13日,終年62歲)、曹葆華(9月20日,終年72歲)、齊燕銘(10月21日,終年71歲)等。

②⑦創刊號“悼念”專欄的文章是《首都隆重舉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

②⑧其中包括樓適夷《憶老舍》、錫金《嚴肅·勤懇·誠篤——追念老舍同志》、李長之《憶老舍》、高君箴《一個難忘的人——憶老舍先生》,以及舒濟《回憶我的父親老舍》。

②⑨關於王康與聞一多兩人的交往始末,參見王立:《王康與聞一多》,武漢:《武漢文史資料》,2019年第10期。

③⑦③⑦張光年:《文壇回春日記》(上),廣東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75、89~90、93頁;第62頁。

③①毛澤東部分是《別了,司徒雷登》的選段。周恩來部分選取的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聞一多都是最忠實最努力的牛,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在人民面前發誓,做人民‘奴隸’,受人民的智慧,做一條牛。”

③②譬如:“一旦從偉大的共產黨那裡受到啟發教育,明辨了真象,他就一往直前,義無反顧,為革命大事直至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抗日戰爭時期,每當聞一多看到周總理在重慶參加談判的消息,就會油然憶起‘五四’時期的往事,憶起總理當年同軍閥面對面

鬥爭的英雄形象。”“‘恢復國畫’只有在他為之獻身的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才成為事實,而且也不是簡單的‘恢復’,而是推陳出新更加發展了。”

③③1977年8月10日,茅盾就老舍未有結論一事,致信王昆侖:“您和我寫個信給烏蘭夫部長,並將胡絮青的書面附呈……此事估計不能馬上有結果,但胡絮青奔走交涉多年,其急迫之情足以理解。我等從旁推動,義不容辭。”參見茅盾:《茅盾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179頁。

③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83頁。

③⑤沙汀:《沙汀文集》(第10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412頁。

③⑥老舍:《詩二首》,北京:《人民文學》,1977年第10期;《老舍同志遺作(三則)》,北京:《北京文藝》,1977年第12期;老舍:《詩四首》,上海:《上海文學》,1977年第3期。

③⑧胡絮青:《〈老舍劇作選〉再版後記》,北京:《人民日報》,1978年4月21日。

④⑩《原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愛國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 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花圈 吳德鄧穎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楊靜仁參加骨灰安放儀式》,北京:《人民日報》,1978年6月4日。

④⑪艾蕪:《艾蕪全集:日記(1967-1982)》(第18卷),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14年,第128頁。

④⑫張光年:《文壇回春日記》(上),第85頁。另:就在眾人歡聚的第二天,郭沫若病逝,第三天,柳青病逝。

④⑬譬如:“黨和政府不僅關懷他的生活和工作,還給了他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生前曾多次親切地接見過他……賣國賊林彪和‘四人幫’反黨陰謀集團,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殘酷地迫害並奪取了我父親的生命。幸虧英明領袖華主席繼承毛主席意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打倒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得到貫徹,使我父親獲得了昭雪……我們一家人打心眼裡感激華主

席,感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④④1978年7月10日,《北京文藝》第7期以“懷念老舍同志”為總題,發表吳伯蕭《作者、教授、師友——深切懷念老舍先生》、端木蕻良《懷念老舍》;7月20日,《人民文學》發表茅盾、傅鐘、夏衍、劉白羽、冰心、曹禺、鄭伯奇、徐遲等的紀念郭沫若文章。臧克家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9期撰文《老舍永在》,以示懷念。

④⑤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④⑥直到1983年6月20日,郁達夫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證書。此外,胡愈之文的發表也與胡長期以來相對明確的政治立場、長期擔任統戰工作的突出貢獻等因素密切相關。

④⑧雷吉斯·德布雷、趙汀陽:《兩面之詞:關於革命問題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頁。

④⑨這三則簡訊分別是磊然:《在上海發現伍光建的翻譯遺稿》、文彥《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將於“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期間開始出版》、丁《“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將於明年出版》。

⑤⑩沈蔚德:《回憶〈蛻變〉的首次演出——兼論關於〈蛻變〉的評價問題》,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⑤⑪文中寫道:“我以為《蛻變》的成功至少並不僅僅在於它只是“對於‘舊的惡的’的暴露和抨擊,固然它對這方面的揭示是非常辛辣和尖銳的;而也在它的“對

‘新的生命’的頌揚和支持。”

⑤⑫李建立:《新時期初期的“外國文學”形象——對〈外國文藝〉創刊號的研究》,太原:《山西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⑤⑬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39頁。

⑤⑭聶紺弩:《聶紺弩全集》(第10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年,第442頁。

⑤⑮何啟智、李晉西編撰,牛漢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第253、119頁。

⑤⑯《世界文學》1977年僅出版兩期,1978年出版四期,直到1979年之後才正式改為雙月刊,延續至今。

⑤⑰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北京:《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

⑤⑱參見陳玲:《〈新文學史料〉創刊號及其讀者反映》,澎湃新聞公眾號,2022年10月27日。

⑥⑩見魏猛克1979年2月25日致林煥平信。林煥平編著:《作家學者書信集》,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438頁。

作者簡介:吳艷,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博士。西安 710049

[責任編輯 桑海]